

目 录

前言.....	(1)
我国学者长期以来对蒙古史的研究概况.....	史锡 (1)
正镶白旗科学家明安图.....	史锡 (12)
成吉思汗青年时代片断.....	史文 (93)
蒙古族学者察哈尔格布西·罗布桑楚力特木的初考	拉希其仁 (97)
正镶白旗八佐山战斗回忆.....	少兴嘎 (139)
察哈尔婚礼 (一)	
.....陶嘎其等口述、史文、察哈尔夫整理	(161)
民间接骨疗法几例.....	孟都 (189)
地名由来的传说.....	拉希其仁等 (200)

我国学者长期以来对 蒙古史的研究概况

史 筠

在我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上，民族史的研究和民族史资料的编纂，是一项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工作。我国浩繁的古代史籍中，记录了各个时期国内各民族的丰富史料，并有不少有关我国各民族的民族史专著。蒙古族是有在公元七世纪左右至十三世纪时逐步出现于历史舞台的。五代时晋的刘昫等撰修的《旧唐书》写成于公元945年，在这部书里最先记录了蒙古族的早期活动。《旧唐书，北狄列传》记载：“室韦者，契丹之别类也……大山之北有大室韦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按：即额尔古纳河）居。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轮）泊（按：即呼伦湖），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大室韦，又东经蒙兀室韦之北，落俎（塔坦？）室韦之南，又东流……”说明在七世纪以前，蒙古人称“蒙兀室韦”，居于额尔古纳河东岸。唐代以后，我国官修的或私修的卷数浩繁的古籍，都或多或少。或详或简地从各个方面记录了蒙古民族各个时期的活动和社会历史情况。譬如，宋代有彭大雅、徐霆的《黑鞑事略》，孟珙的《蒙鞑备录》；元代有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元朝秘史》、《皇元圣武亲证录》，苏天爵的《元朝名臣事略》，朱宗元的

《蒙古字韵》；明代有宋濂、王祿等的《元史》，胡粹中的《元史续编》，火源洁的《华夷译语》，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等等。这些都是早在十二世纪至十七世纪期间关于蒙古史、元代史或蒙古语文的专著。中国是世界上记录蒙古族的活动最早，保存有关蒙古史料最丰富的一个国家；也是对蒙古史的研究工作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国家。我国有关蒙古史的汉文、蒙文等各种文献的史料价值是举世公认的。这是历史上我国汉、蒙各族学者对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

我国蒙古族学者对本民族历史的记述和研究，在蒙古史学界占有重要地位。

早在十三世纪时，蒙古族学者就写过一些本民族的编年史和历史传说。伊朗历史学家拉施特写《史集》时，就曾利用过当时蒙古人自己写的编年史和传说。其中包括《金册》，即《阿勒坦德卜特尔》，或叫帝王史册。这是成吉思汗家系的秘史，藏在可汗的宝库中，只准许少数人接触它的。

十三世纪中叶写成的蒙古编年史，现在还保留着的就是用汉文音译的古维吾尔字体的蒙文历史著作《元朝秘史》，即《忙豁仑纽察·脱察安》。此外还有一部《皇元圣武亲证录》，基本上是《元朝秘史》一书的汉文翻译（译于1312—1320年）。

《元朝秘史》写的是蒙古汗国建立的历史，包括从八世纪起到十三世纪中叶止蒙古族的约五百多年的简要历史。内容包括蒙古族古老的历史传说、蒙古各部落间的历史发展关系、蒙古草原的社会经济生活情况，并较详细地记述了成吉思汗本人及其家系为建立蒙古汗国，统一蒙古民族的斗争，

以及成吉思汗对外实行军事侵掠的过程。

《元朝秘史》是一部具体生动地叙述历史事件和人物传记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优美的文学著作。这是研究蒙古族早期的历史以及研究我国北方从八至十三世纪各民族关系史等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

在蒙古族兴起以前，我国北方草原各民族，虽有过长期的悠久的历史文化，而且在这些地区生活过的有的民族曾有自己的文字，或借用过汉字。但是，在蒙古族兴起以前这里的各族，很少保存下来过自己的历史文献。蒙古族在成吉思汗以前，也是“无文籍”的。《元朝秘史》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我国古代北方草原民族所保存下来的第一部历史文献。

对古代北方蒙古草原各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主要是靠汉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这些民族自己的文献却很少。这对于研究这些民族的历史文化，就不能不遇到很多困难。而《元朝秘史》却是蒙古人自己写下来的本民族早期活动的文献，这样的著作是其他民族所记述的文献所不可比拟的。古代其他各族学者对草原民族的了解，他们关于草原民族的知识，是十分有限的，有的甚至只是道听途说，不足为据的。

《元朝秘史》有几个特点：

第一、它记下了蒙古族及这里某些其他古代民族祖祖辈辈的传闻，把蒙古族兴起及其以前的蒙古草原社会，粗线条地但又是如实地描写出来一个历史轮廓。这应该是关于古代蒙古草原社会历史的第一手材料。

第二、它记录了关于成吉思汗时代的一部分真实历史情况，是研究蒙古兴起时期的可靠史料。《元朝秘史》所记史

料的真实可信，是学术界所公认的。钱大昕说：“惟《秘史》叙次颇得其实”。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说：《秘史》“质实可信”。

第三、钱大昕说《元朝秘史》“其文俚鄙，未经词人泽润”。李慈铭说《元朝秘史》“译于元初，皆用俚俗语，欲人易知其事，……”他们都不大懂得这部书是用通俗的民间文学语言、民间诗歌、口碑、传说，甚至寓言等形式写的。这是蒙古历史上的《战国策》，也是蒙古历史上的《诗经》。它包含着当时蒙古社会历史文化各方面的丰富内容。

蒙古族学者有自己写编年史的优良传统，蒙古族编年史的编写工作，各个时期都有。

十七世纪编年史中最杰出的一部是鄂尔多斯封建主萨囊彻辰著的《额尔德尼脱卜赤》（《宝史》），即《蒙古源流》。

《蒙古源流》写成于1662年，是作者根据当时所能见到的很多史书和史料汇编而成的。张尔田在《蒙古源流笺证序》中说：“其书根据红册、黄册七种史料而成，以喇嘛佛教为纲，以各汗传统之世系为纬，而又上及蒙古种族发源之土伯特、额讷特珂克，遗闻坠掌，粲然毕载。”内容可分为十个部分：

第一、序言。

第二、宇宙的发生、结构和人类的起源。

第三、印度诸王和印度佛教史。

第四、西藏诸王和西藏佛教史。

第五、蒙古诸汗与佛教关系史。

第六、清太祖至甲申（1644年）承明统。

第七、追溯明洪武至崇祯汗之世系。

第八、顺治统一中国至康熙即帝位。

第九、后记。

第十、书后题诗 3 1 6 行。

作者是在写一部关于他的家族从宇宙形成直到他本人当时“最完备”的历史。《蒙古源流》中最有价值的是关于明代蒙古史部分，这也是全书中占分量将近一半的内容。这一部分纪年明确，世系清楚，对研究明代蒙古史很有史料价值。①

《蒙古源流》同样既是一部优秀的历史作品，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

蒙古族有十分重视自己的历史，重视用本民族的历史教育后代的优良传统。还在没有文字的时候起，蒙古人就把自己祖先的历史编成口头历史故事，作为教育后代的材料，代代相传。同时，蒙古史学者在写历史时，又往往是把传说和史实结合，既有神话传说，又有历史写实。后来，在喇嘛教传入蒙古后，大多写历史的人本身就是喇嘛，他们深受喇嘛教思想的影响，又往往把宣传宗教教义和历史记实结合起来。

在明末清初蒙古人写历史存在着两种不同观点的斗争。譬如用藏文写的《蒙古佛教史》与B.B.拉德洛夫盗回俄国的《黄史》，就代表了不同的蒙古王公的利益。前者是为赞成中国统一的所谓“亲满”王公利益服务的，是黄帽派喇嘛的作品；后者是反映了所谓“蒙古民族思想”、“西藏民族思想”的“抗清”王公的思想的，是红帽派喇嘛的作品。②

注①见额尔德尼巴雅尔、周清澍：《纪念（蒙古源流）成书三百周年》。

②参看H鲁科夫《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史著作》（余大均译）

清代用汉文写作蒙古史等历史著作的有博明，即博尔济吉特·希哲。博明，字西斋，北京人，两江总督邵穆布的孙子，乾隆年间曾参加撰修《续文献通考》，“外任云南迤西道，内官兵部郎中”。著有《西斋偶得》（1747年）、《凤城琐录》（1801年）、《西斋诗辑遗》（1801年）。翁方纲《西斋杂著二种序》说：“西斋少承家世旧闻，加以博学多识，精思强记，其于经史、诗文、书画、艺术、马步射、翻译国书原流以及蒙古、唐古忒诸字母，无不贯串娴习”。

《西斋偶得》刊行于清嘉庆六年（1801年），分上、中、下三卷。这是一部笔记性的杂著，内容有辽、金历史及元、明时的蒙古史；有天文历算；有物理、草木虫鱼；有语言文字；有名物制度；还有国外见闻等。

博明，“精通蒙、汉、满、藏语文”，他的著作“对古代蒙古史、尤其是辽、金、元史，明代蒙古史等，作了深刻的考证”。①

清代，我国学术界对蒙古史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由于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相继用兵于西北，以统一西北各族于祖国，在乾、嘉年间曾引起了学术界对我国西北各少数民族历史，特别是对西北边疆地理的研究。譬如徐松的《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事略》；祁韵士的《蒙古王公表》、《西陲总统事略》、《西域释地》、《藩部要略》、《西陲要略》等。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我国各民族面临着外国势力的严重侵略。尤其

①余元庵《内蒙古历史概要》。

是从欧洲沿陆路扩张到西伯利亚来的沙俄侵略者，既通过不平等条约公开抢劫，又违背这些不平等条约暗地偷摸，得寸进尺地侵占着我国东北、华北和西北的大片领土。面对沙俄的扩张侵略政策，在我国边疆问题日益严重的形势下，我国一批爱国的史学工作者，曾掀起广泛研究我国西北边疆历史地理和蒙古历史问题的高潮。他们着重研究我国蒙古、新疆等地区的历史地理沿革，和祖国的历史关系以及历代中央王朝在这些地区的设治情况。他们的研究目的，在于引起祖国人民对这些边疆地区的关心，激奋祖国各族人民警惕敌人侵略的爱国主义热情。“西北舆地之学”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并在清潮末年曾盛极一时。这批史学工作者中，以张穆、何秋涛两人贡献最突出。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于蒙古地理形势，与各部落之历史，及各盟旗之概况，记述极为详尽”。①这是一部研究蒙古各部及其驻地的历史地理沿革的重要著作；也是一部记述清代蒙古族社会历史情况的重要著作。

张穆汇集了有清一代对蒙古族的了解，综合了国内对蒙古史的研究成就而写成的这部《蒙古游牧记》，堪称为清代蒙古史研究的代表作。清代以来很多研究蒙古史的人都是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研究古代蒙古史和元史，张穆则把主要研究课题集中于清代蒙古各部的社会历史及蒙古各部的驻地方位上，把蒙古史的研究引向当代蒙古社会，这在蒙古史学史上应视为是独树一帜，别开生面。

被称为“晚清西北地理大家”的何秋涛，编著了一部

①见李思纯：《元史学》

“以北徼与俄国关联者为范围”的《北徼汇编》（后改名为《朔方备乘》）。何秋涛的这部著作，着重于考证俄国侵占的西伯利亚的历史地理沿革、辽金元各代北徼各地历史疆域以及研究和记述中俄交涉史料。这部著作对中国人民认识从欧洲跑来横行霸道地侵略我国的恶魔“罗刹”即沙皇俄国以及了解其与中国的关系，意义重大。

清代学者对蒙古史的研究工作很值得我们重视。清代学者中的不少人，特别是“西北舆地之学”的代表人物，是从保卫祖国边疆，加强蒙汉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反对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政策的爱国主义立场和愿望出发来研究蒙古史的；蒙古史研究工作中的这种爱国主义传统，值得发扬光大。

在清朝末年，与“西北舆地之学”同时盛行，并成为学术界“一时风尚”的，是“元史学”的发展。

《元史》是明朝初年由宋濂、王祿等人奉诏纂修的。在我国的“二十四史”中，《元史》这一部书是被学术界认为由于成书草率，因而内容芜乱缺漏，舛误百出。清代学者曾有不少人热衷于改修或订补《元史》的研究工作。“中国之元史学，则清代康、乾之间，略有萌芽，至其成为学者争研，一时风尚，则在清末同治、光绪之时。柯至志劭《新元史》成，而略告一小结束焉。”①清代改修或订补《元史》的学者和主要著作，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广泛搜集我国的有关史料，特别是利用明代修《元史》时所未见到的《元朝秘史》等资料，“以补证旧闻，订正谬误”，以便改修一部新元

①见李思纯：《元史学》，66页。中华书局1930年版。

史。属于这一类工作的有邵远平的《元史类编》，钱大昕的《补元史氏族表》、《补元史艺文志》，魏源的《元史新编》，何秋涛的《圣武亲征录校正》，李文田的《元秘史注》等。另一类是利用新接触到的西方各国特别是波斯等地的有关蒙古征伐和统治中亚及东欧时的史料，“以补中土所未闻，证中土所未确，以制造一新史者”。属于这一类工作的，有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清末民国初年屠寄的《蒙兀儿史记》等。在以上这两类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柯劭忞于清末和民国初年，用了四十年多的功夫，“就中西史料，集其大成，改造全史，”编出了一部二百五十七卷的《新元史》。①柯劭忞的这部《新元史》，实际成了有清一代研究元史的总结。

清代元史学的发展，对蒙古帝国和元朝的历史史料的订正和汇集，作出了贡献，为进一步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些方便条件。

民国成立以后，我国史学家，一面继承了清代元史学的传统，一面吸收了西方学者的史学方法，这个时期的蒙古史研究的成就是可观的。譬如关于古代蒙古族的考证工作；关于蒙古兴起和元代蒙古史问题的研究；关于元代典章及社会制度等的研究，都为进一步研究蒙古史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这个时期王国维的校注《蒙古史料四种》；冯承钧的致力于翻译介绍西方的蒙古史料和蒙古史研究著述，为我国蒙古史研究工作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推

①见李思纯：《元史学》；金毓：《中国史学史》。

行“大陆政策”，极力分裂蒙古民族和汉族的历史关系，对我国实行“分而治之”的侵略阴谋。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批所谓“蒙古学者”，如白鸟库吉、箭内互、矢野仁一等，别有用心地用歪曲和篡改历史的手段，大量地发表蒙古史论著，散布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谬论。而这时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却一面对日本妥协投降，一面在反共反人民的同时，对国内各少数民族，特别是对蒙古民族实行反动的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也有一小部分所谓“边疆学者”，连篇累牍地为这种反动的民族压迫政策大吹大擂。

“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我国除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外。“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

①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就很重视对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研究。还在抗日战争初期，即1940年左右，在革命根据地延安就成立过“民族问题研究会”、“蒙古文化促进会”

“蒙族文化陈列馆”、“成吉思汗纪念堂”等，有组织有领导地对蒙古民族问题、回回民族问题等，进行过系统研究。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的一批爱国的革命文学家，特别是在延安等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真地研究了蒙古社会历史问题。他们中的有些人还通过种种途径利用过内蒙古若干地区的社会调查材料。他们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针对日本美国主义的“东洋学”和“蒙古学”中的反动观点，特别是针对所谓“满蒙非中国领土”的谬论，在蒙古史学术领域内展开了尖锐的斗

①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争。他们的有些著作也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汉族主义的理论和政策，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时的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应该首推延安民族问题研究会编的《蒙古民族问题》一书。这是一部集体著作。虽然，现在看来，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部著作的某些提法有不恰当之处，但是总的说来它确实是我国史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写出来的第一部有一定科学水平的蒙古史专著。这部书的作者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学术资料相当困难的条件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器，初步探索了蒙古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及内蒙古和祖国的历史关系；他们历史主义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决蒙古民族问题的政策的正确性；他们并用铁的历史事实对日本帝国主义关于蒙古史的谬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民族主义政策，进行了揭发和批判。这部关于蒙古历史问题的专著，一反我国过去长期以来蒙古史学术界不少人或则仅注重于具体史实的考释工作，或则以蒙古史料代替蒙古史的倾向，而为科学地研究蒙古史打开了一条新的战斗道路。

正镶白旗科学家明安图

史 筠

明安图，字静庵，蒙古正白旗人，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时期的一位著名数学家、天文历象学家和地理学家。他曾历任钦天监五官正、兵部郎中和钦天监监正等重要职务；并著有《割园密率捷法》等有名的数学著作，在我国科学史上有过重要贡献。

明安图死后二百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他的生平和科学事业，曾不断有人论述过，不少文籍都有一些关于他的工作的记载。但是迄今为止，对明安图和他的事业还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有关文籍的记述都较简略，譬如明安图的生卒年月就还暂难确切考证；有的记述还相互矛盾，譬如明安图究竟是蒙古人，还是满洲人，众说纷纭；也有的记述，其中包括清代阮元的著作，甚至有张冠李戴的现象，譬如把明安图和明图两个不同人物混为一人，如此等等。因而在学术界相当长时间以来，对明安图这个人物的认识还较混乱，特别是对他在科学史上的贡献，还缺乏较全面的评价。

本文试图根据档案史料及有关文献记载，对明安图在科学史上的贡献作初步研究，并在文中较多地摘录汇集有关史料，以供学术界进一步研究明安图时参考。

一、明安图是蒙古族人考

关于明安图是不是蒙古族人问题，我国学术界至今仍有异议，有人怀疑他不是蒙古人，而是满洲人^①。把蒙古人明

安图肯定地说成是满洲人的始作俑者是清代学者阮元。据清代档案史料②记载，在康、雍、乾时期，同时在钦天监工作的既有明图，又有明安图。现存清代档案钦天监题本中就有不少是由明图和明安图同时署名奏呈的。譬如雍正六年（1728）的一份题本是：

“钦天监监正臣明图等谨题为月食事，己酉年正月十七日壬戌望月食。京师月食十六分二十四秒，十七日丑正二刻十二分初亏，卯正二刻五分复圆。……雍正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钦天监监正臣明图；钦天监监正加礼部侍郎銜臣戴进贤；……；五官正臣明安图；……。”又如乾隆四年（1739）的一份题本是：

“……题为恭进（乾隆五年庚申）时宪书式样事，……。乾隆四年二月二日，钦天监监正加太常寺卿銜加七级臣明图；……食员外郎俸五官正加四级臣明安图……”。按，明图是在康熙四十年至乾隆四年（即1701至1739）期间为钦天监满人监正，他的最后职銜是“钦天监监正加太常寺卿銜加七级”。③在明图任监正期间，明安图在钦天监只官至时宪科五官正；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即明图解除钦天监监正职务后二十一年，明安图才继任钦天监监正职务，④这时明图可能早已不在人世。清代文籍中最早把明安图和明图混为一人的，见于汪莱⑤在1820年以前嘉庆中期写的《衡斋算学》七卷本卷六和董佑诚⑥在1821年写的《割园连比例术图解后序》中。汪莱把明安图写成“明君图”即明图君；董佑诚更说明安图是“乾隆初钦天监监正明图”。本来，明安图的弟子陈际新在1774年写的《割园密率捷法序》中开宗明义第一句

话即正确地写明了《割园密率捷法》一书是“钦天监监正明静庵先生”所著。他写道：

“钦天监监正明静庵先生，自童年亲受数学于圣祖仁皇帝，至老不倦。病革时以遗稿一帙囑其季子景臻，命际新续而成之。曰：‘此割园密率捷法也。……’”⑦罗士琳在1839年写的《割园密率捷法后跋》中也写明：

“割园密率捷法四卷，……是书乃乾隆中监正明静庵先生所著，……案静庵先生名明安图，奉天正白旗生员……”⑧这里，罗士琳正确地说明了明静庵即明安图，且系“乾隆中监正”，而不是如董佑诚一样写成“乾隆初……监正”。只是在这里罗士琳对明安图的籍贯或族别笼统地写成了“奉天正白旗生员”。但是，对第二年，即1840年夏四月以前，罗士琳在《畴人传续编》中为明安图立传时，即已纠正了这个笼统记载。而确切地写明：

“明安图字静庵，蒙古正白旗生员。官钦天监监正。受数学于圣祖仁皇帝，故其所学精奥异人。……”

看来，人们对于罗士琳的这个重要修改，没有引起重视。当1839、1840年间，岑建功校刊明安图《割园密率捷法》一书并正式出版时，阮元看过上述陈际新的罗士琳的序、跋后，在他1840年正月写的《割园密率捷法序》中，却恰恰是根据罗士琳后来已改正的明安图是“奉天正白旗生员”这一笼统记载，写成为：

“昔元家藏钞本割园捷法一帙，不知为何人之书，故畴人传未载。今致仕归扬州，读天长岑氏绍周所校刻割园密率捷法四卷及甘泉罗氏茗香跋，始知是书为满洲明静庵先生撰于乾隆之时。……”⑨过了三个月，到1840年夏四

月，待阮元看过上述罗士琳写的《畴人传续编》中的“明安图”传后，他在《畴人传续编序》中却毫未注意罗士琳的更正，而和董佑诚一样把明安图误认为就是明图，肯定地写成：“明氏为乾隆初满洲人，其割圆密率捷法，海内无刊本，……”。

很明显，阮元是承袭了汪莱、董佑诚把明安图和明图混为一人的错误，并根据罗士琳所早已更正过的“奉天”人的说法，而硬把乾隆中监正蒙古人明安图写成了乾隆初监正满洲人明安图。就这样，以讹传讹，明安图由“奉天”而“满洲”，“而满洲人”；陈杰在他的《算法大成》上编卷三中又写成为“乃康熙朝长白明静庵监正”。

关于明安图的族别，清代宦家刊刻的职官书如《爵秩全览》、《缙绅全书》等就有所记述。乾隆十年（1745）秋季荣锦堂《爵秩全览》载：

“钦天监……五官正，食员外郎俸加四级明安图，蒙古正白旗人，官生。”

隆十八年（1753）荣锦堂《爵秩全览》载：

“钦天监时宪科五官，食员外郎俸加四级明安图，蒙古正白旗人，官生”。

“乾隆二十二年（1757）《缙绅全书》载：

“钦天监食郎中俸留五官正任加二级明安图，蒙古正白旗人，官生。”乾隆二十五年（1790）《满汉缙绅全书》载：

“钦天监监正加二级明安图，蒙古正白旗人，官生”。在同一书上还记有明安图的儿子明新的职衔和族别籍贯：

“钦天监……食俸天文生……明新景臻，蒙古正白旗人。”关于明新的记载，这类职官书中还甚多。譬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崇寿堂《大清职官迁除录》载：